

第 一 编

卢沟桥事变前日本 人民的反战斗争

(1931 年 9 月—1937 年 6 月)

第一章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

1929年10月，从美国开始的经济危机，迅速席卷各资本主义国家，波及全世界，给持续萧条的日本经济以更加惨重的打击。日本对外贸易额急剧下降，1931年与1929年相比，进口减少了44% 出口减少了46.6%。工业生产剧减，1931年比1929年，工业品总产量减少了33%。价格暴跌，1930年10月比1929年4月，生丝价格下跌了60%。企业纷纷倒闭，工人大量失业，1932年几达49万人，连同半失业者，共有300万人，广大劳动人民挣扎在饥饿线上。

危机对日本农村的打击，更加沉重。1930年农业丰收，但价格猛跌，使广大农民陷入饥饿深渊。北海道因霜冻歉收，农民以草根为食，甚至廉价出卖青少年妇女。

深刻的经济危机，加剧了日本社会的阶级矛盾，工农革命运动日趋高涨。1927年，工人罢工383次，参加人数46600多人；1936年，罢工人数增加到1945次，参加人数达42万多人。农村中反抗地主剥削的租佃纠纷，1929年有2430起，1935年增加到6800起。在日本共产党等进步党派、组织影响下，工人、农民、知

识分子等纷纷组织工会、佃农协会、民主团体，起来反对垄断资产阶级、法西斯军部的反动统治。

面临全面政治、经济危机，日本统治阶级急于进一步对外侵略，更多地攫取殖民地，以求摆脱困境。1927年，日本统治者就在其制订的《对华政策纲领》中，论证了日本以满蒙为对外侵略基地的全球战略，主张“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日本统治者把这种主张，贯彻于行动。他们处心积虑地阴谋长期霸占中国东北地区。1930年中国东北有外国人113万，除80万朝鲜人外，日本人竟占27万人。这一年，东北地区对外贸易总值共4.62亿海关两，其中对日本的贸易，就占2.27亿海关两，为总值的49%；东北地区外国投资共合20.63亿日元，其中日资就达15.11亿日元，占73%，为日本对外投资的一半左右。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扩张，必然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抗。在全国抗日运动的影响下，加以日本关东军于1928年炸死张作霖，使张学良与日本的矛盾不断加深。中国人民大力抵制日货，使日本对华输出猛减；满铁^①利润下降。日本统治者为扩大其侵略权益，决心通过战争霸占中国的东北地区。

为了发动侵华战争，日本政府实施了军需通货膨胀政策。从1931—1936年的六年时间里，日本政府的年开支总额从14.77亿日元，增到22.82亿日元，增加了50%左右。其中军事开支竟从4.61亿日元，猛增到10.89亿日元，增长了一倍多。

这样日本工业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与军事有关的工业得到畸形发展。1928年，重工业、化学工业仅占全部工业产值的

^① 满铁：全称为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殖民侵略和掠夺的机构。

28.9%。1937年竟提高到57.2%。在这六年里，按不变价格计算，食品工业增长了4%，钢铁机械工业却增长约1.46倍，化学工业增长了1.5倍，陆军各种武器弹药的生产，增长了3.93倍，汽车、飞机等的生产，增加得更快。

在经济军事化过程中，日本政府使三井、三菱等老财阀的军事工业扩张倾向大为加强，特别是扶植了一批以发展军事工业为主干的新财阀，从而使日本的军事装备大幅度地提高。在“九·一八”事变前，日本的武器装备，还远远落后于美英等国。六年后，卢沟桥事变前，日本军队的各类大口径火炮的数量，已十分接近美国和英国。

在经济危机中，日本法西斯势力更加疯狂。他们在文化思想上严酷统治、麻痹人民的同时，制造了一系列暴乱。如1932年12月1日“血盟团”^①分子刺杀民政党领导人井上准之助。1932年5月15日，以士官学校学生为主的陆海军法西斯分子，袭击首相府等地，枪杀了首相犬养毅。“5·15”事件后，军部就反对政党组阁，主张恢复由元老提名，经军部首脑同意、天皇任命来组阁。这样，1924年—1932年的日本政党内阁时期宣告结束，军事法西斯体制在形成中。

1936年2月26日清晨，一千多名日军官兵，在东京发动暴乱，内阁大臣斋藤实、藏相高桥是清、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被枪杀。事后虽对少数暴乱者判刑处死，但军部却借此确立了以自己为核心的法西斯势力的统治。

日本军部精心策划、指挥了“九·一八”事变。当时参与策划“九·一八”事变阴谋的关东军参谋花谷正，在《回忆录》中

^① 血盟团的盟主是佛教日莲宗僧侣井上日召。他们组织农村青年以及农村出身的下级军官进行疯狂的杀人活动。

写道：“1931年春，关于柳条沟（按：应为柳条湖）事件的大致计划，已经制定。”这份《回忆录》，详细描述了日军上下密谋策划此次事变的内幕。1931年，长期热心于对中国侵略的本庄繁被任命为关东军司令。上任第三天，他就给陆军大臣写信：“本庄繁熟察帝国存在及充当一等国地位，势非乘此世界金融凋落，露国（按：即苏联）五年计划未成，支那统一未达以前之机，确实占领我三十年经营之满蒙……”^②于是日军于1931年9月18日夜炸毁沈阳柳条湖一段铁路，反诬是中国军队所为，并以此为借口进攻我军阵地，强占沈阳。9月24日，几乎占领了辽宁全省。9月21日，占领了吉林省大部分。到1932年1月，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1932年3月1日，日本侵略军一手炮制的满洲国就被牵到台上亮相。1933年2月，日伪又侵占热河省。当然，这种情况，也是由于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对日寇实行不抵抗政策造成的。

1932年1月，日军又在上海挑起了“一·二八”事变。与“九·一八”事变不同，它遭到了中国人民和十九路军官兵的坚决抵抗。日军屡遭打击，三易战场统帅，兵力逐步增到十万人。中国方面的抗战部队——十九路军、第五路军一部分，不到四万人，在全国人民，特别是上海人民的大力支持下，顽强抵抗，使日军寸步难进。但蒋介石政府一意妥协，于1932年5月5日，和日军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

接着，日军的侵略魔爪伸向华北。1933年侵入河北东部、察哈尔东部，迫使国民党政府于1933年5月1日，签订了《塘沽协定》，于1935年6月10日签订了《何梅协定》同月27日签订

花谷正：《满洲事变的策划》，见《文献昭和史》之2：《满洲事变和二·二六》，日本平凡社1975年版，第72—91页。

陈觉：《国难痛史资料》第一卷，东北问题研究会1932年版，第33、34页。

了《秦土协定》。接着日方又导演了所谓“冀东防共自治”事件等。与此同时，关东军加紧入侵内蒙古地区，成立了“蒙古军政府”，企图使内蒙古脱离中国，成为第二个“满洲国”。

1936年11月25日，日本与德国签订了《关于共产国际的协定》^①，加紧准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日德《关于共产国际的协定》，主要内容是以反对苏联、反对共产主义运动为借口，相互进一步勾结，准备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这个《协定》鼓舞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

第二章

日本国内人民的反战斗争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统治阶级的战争机器，加快了运转。人民被法西斯势力鼓动起来的战争热情，开始下降。取而代之的，是厌战、怠战，以至反战的情绪。

站在这一斗争前列的，是日本共产党。日本共产党从 1922 年 7 月诞生之日起，就在其《纲领草案》中提出：“日本应从朝鲜、中国、台湾和库页岛撤出军队”。

1929 年 1 月，日共机关报《赤旗报》发行了小册子——《第 56 届帝国国会和日本共产党的口号》，指出：“今天我们只呼喊不干涉的口号，已经不够了。因为在这个口号下，同我们的统治阶级进行实际的斗争，必须把‘立即撤出在中国的所有日本军队’的呼声，变成群众的呼声。”^①

1931 年 7 月 6 日，日共《赤旗报》发表题为《起来向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准备作斗争》的文章，号召日本人民“不出一分钱的军费！不送一个人去当兵！工人和贫农应当拒绝担负为三井、三

① 《日本共产党六十年》第 41 页，日共中央编，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菱、住友等大金融资本家利益进行的帝国主义强盗战争的一切赋税和兵役。^①

1931年8月1日“反战日”那天，日共在各地组织了秘密集会和示威游行，要求“日本军队立即从‘满洲’、朝鲜和台湾撤出”！

“九·一八”事变第二天，9月19日，日共发表了《告全国工人、农民、士兵书》，号召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不干涉中国内政：“工人、农民、士兵们！亲爱的同志们！要和中国的工人、农民、士兵团结起来，进行共同的革命斗争！”

“立即从奉天以及一切占领地区撤出军队！立即撤回在中国‘满洲’的日本军队的军舰！决不把一个士兵送上前线！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一切军事行动！同帝国主义战争的新的危险进行斗争！”

“保卫革命的中国！支援红军，保卫苏维埃联邦！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苏维埃的日本！”^②

9月20日，日本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联合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宣言》，指出：“这次日本帝国主义用暴力强占东三省，是想把东三省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的直接行动……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这种暴行，中国与日本的工农是坚决反对的……中、日两国工农民众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日本的海、陆、空军滚出中国去！”

1933年5月26日，《赤旗报》的社论《反对掠夺华北，组织群众性的反战活动》中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极力发挥反革命宪兵的作用，以求在最后瓜分中国时，得到更多的份额……进一步几十倍、几百倍地扩大正在进行的强盗式的战争，那么，不仅前线

易显石：《九·一八事变》第333页。

《日本共产党六十年》第48页。

要有几十万、几百万人牺牲，而且在国内被活活饿死和死于恐怖之下的牺牲者，也将不计其数，只有一小撮地主、资本家，靠工人和农民群众的这些牺牲，来养肥自己……

“在所有的经营单位和企业、部落立即召开群众性的集会和恳谈会等，通过决议反对占领华北。为了把这一群众性的反战决议发展为强大的群众性行动，要提出同群众生活最密切相关的反战的日常斗争，立即大胆着手进行组织群众的工作。”^①

特别要提到的是：日共领导人片山潜始终积极地投身于反战运动。他为了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召集会议，发表演说，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号召全世界工人阶级，特别是日本工人阶级，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九·一八”事变爆发时，片山潜已是 77 岁高龄的老人，得了重病住进医院。病情好转后，仍在休养中，就投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斗争。该年 10 月 1 日、5 日，他分别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日本无产阶级》，和《侵略满洲与日本无产阶级的反帝斗争》两篇文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散布民族主义、排外主义、制造借口侵略中国的罪行，号召日本工农群众和各界人士，支持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与日本法西斯政府作坚决斗争。

在片山潜的不知疲倦的奔走下，1932 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了世界反战大会。会上建立了国际反战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提议 1933 年在上海召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远东反战会议。这个计划发表后，日本共产主义青年同盟、全国工人协议会和反帝同盟一起，发表了支持上海反战会议的呼吁书，号召各地各单位成立反战委员会，不分党派，团结一切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人们，起来进行反战斗争。在片山潜的支持下，1933 年，英国

前陆军大臣马莱爵士，率领世界人民反战大同盟代表团到达上海。在中国共产党人和以宋庆龄为首的一些进步人士的努力下，排除了国民党当局的百般干扰破坏，在上海召开了远东反战会议，给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以极大的支持和鼓励。^①

在日本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日本国内的反战斗争汹涌澎湃。在东京、大阪、横滨等地大工厂纷纷召开反战代表会议，组织游行示威。仅东京一地参加者就达 2500 人。农村也开展了反战运动，仅富山县就有六个村单位举行农民反战大会，有的还举行了游行示威。

1928 年 5 月，京都、大阪、名古屋、神户、福冈、奈良等地的劳动群众，在“反对出兵中国”的口号下，结成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同盟，举行了两次“反对出兵周”活动。1932 年全国工人协会领导了东京地铁工人要求“改善出征士兵待遇”的罢工，占领工作场所，取得了胜利，引起了很大反响。同年，全国农民协会，确定了反战行动纲领，推动广大农民进行反战斗争。富山市郊东北部农民还进行反“献金”运动。有的农村还组织“拿米来（即要饭吃）”“索夫团（即要回丈夫）”等活动。

1929 年到 1931 年，日本著名反战作家黑岛传治先后发表《反战文学论》、《入伍青年应该干什么》等反战文章，号召日本人民变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为反对日本军部统治的革命战争。

从 1930 年前后开始，在日本共产主义青年同盟率领下，青年们的反战运动，也迅速兴起。1932 年 2 月 9 日，东京明治大学等校学生举行反战示威游行，散发反战传单，高呼“打倒日本军阀！”横滨等地学生也举行了示威游行，反对在上海扩大侵略战争。据

张劲夫：《在和陶夫子相处的日子里》（陶夫子指陶行知），《光明日报》1993 年 8 月 29 日第 3 版。

日本宪兵机关的统计，各界人民反战、反军部的斗争，1930年为1398次，1931年为1905次，1932年为2437次。

一些合法的左翼工会组织，也加入了反战反法西斯的斗争行列。1933年6月，由关东劳动组合会议提议，成立了“反纳粹、粉碎法西斯同盟”。关西地区等地也成立了类似组织。1931年，日本有818个工会，36.9万会员，是日本工人运动在战前的最高峰时期。

农民的租佃纠纷，反抗斗争，也在继续发展。租佃纠纷，1930年有2478件，1936年发展到4000件。

在中间阶层、知识界中，也出现了反战反法西斯斗争的火焰。1931年到1932年，长谷川如是闲出版了《批判日本法西斯主义》一书。“九·一八”事变的当天，全国劳动大众党领导人堺利彦发表声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并且领导成立了“反对对华出兵斗争委员会”。另外，大山郁夫、浅沼稻次郎等，也持这种正义立场。

1932年7月，各无产者团体联合提出要求：释放“三·一五”、“四·一六”事件^①的被捕者，不少进步人士给以支持。

1933年8月，日本作家秋田雨雀、江口涣、长谷川如是闲、藏原惟郭、加藤勘十等一百多人，不怕迫害，在东京召开了“远东和平之友”成立大会。1935年，美浓部达吉教授发表论著，主张天皇是国家机关，遭到起诉，他不屈从权势，捍卫自己的主张，在贵族院答辩两小时，使不少企图加罪于他的人，也受到感动。

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中，也发出了反战呼声。石桥湛山提出“满蒙放弃论”，批驳了“满蒙是日本生命线”的谬论，主张与

^①指1928年3月15日，1929年4月16日，日本政府对日本共产党和其他进步分子的大逮捕事件。

中国发展和平的经济贸易关系，指出发动侵略战争，与中国为敌，与世界列强为敌，必将重演 1918 年德意志帝国的惨败悲剧。在 1937 年 1 月召开的第 20 次国家议会上，政友会代表滨田国松公开指责寺内陆相：“军部干预政治……包揽国政，实际上将流于寡头专制的作风。”^②

1932 年 7 月，日共成立了以风间文吉为首的军事部，负责整个反战兵运工作。同时，建立了关东军事委员会、关西军事委员会、水兵委员会等兵运领导机构。在兵营、舰队中，也建立了各种基层反战组织，展开了反战活动。

1932 年 2 月，日共在吴港地区创办了面向海军水兵的报纸《耸立的桅杆》。在阪口喜一郎等领导人和响应他们号召的水兵们的努力下，《耸立的桅杆》接连发行到第六期（1932 年 10 月）。大量的《耸立的桅杆》和《赤旗报》等，被散发到现役水兵手中。在这前后，吴港海军工厂日共组织发行了报纸《轰鸣的吊车》。

1932 年 7 月 15 日，日共创办了以陆海军士兵为对象的报纸《士兵之友》，并且编印了大量的反战小册子。在反战传单《告各位士兵》中写道：“在‘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中，已有 4000 名士兵伤亡了。满洲成了日本实实在在的殖民地，谁得了好处？只有资本家和地主们，满洲的煤铁，饱了他们的私囊，成为剥削工农的手段……各位士兵，所谓‘天皇的军队’，只是为了维护资本家、地主利益而存在。士兵仅仅是为了资本家、地主的利益，而在兵营、军舰内像奴隶一样受压迫，像囚徒一样生活；仅仅是为了资本家、地主的利益，去镇压国内工农的解放运动，残杀外国的工人、农民；仅仅是为了资本家、地主的利益，把战争

全称立宪政友会，日本资产阶级主要政党，代表官僚及财阀的利益。
《太平洋战争史》之二，第 47、48 页。

强加于世界工农的希望——苏联红军和革命中国的红军。我们士兵必须弄清楚这些事情，工农是我们的兄弟，是父母。我们是穿军装的工人、农民，我们反对这一切！”这份传单号召日本人民起来，“把帝国主义战争转为内战！打倒资产阶级、地主的天皇制！”

在日共引导下，日本士兵纷纷行动起来。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第二师团驻仙台市时，当军国主义者举办演讲会进行战争煽动时，该师团 30 多名士兵喝倒彩，把他们赶下了台。1932 年 5 月，驻公津若松的步兵第 29 联队二等兵金田，不怕受迫害，在兵营中张贴反战传单，当他被逮捕时，身上还有 50 张印有“反对出兵满洲，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等内容的传单。据统计，1931 年，在日本军队、军工厂中，曾发生反战事件 126 起；1932 年，增加到 204 起，等等。

日本共产党成立后，就坚持反战、反法西斯斗争，一直处于非法状态。从 1928 年到 1933 年，经受了五次大逮捕，组织上遭到严重破坏。这种疯狂的政治迫害日益加剧，逮捕范围不断扩大。据统计，从 1928 年到 1933 年，因违反所谓“维持治安法”而被揭发者，共 6900 多人，其中受到起诉者有 4175 人。日本反战民主进步人士几乎都遭到迫害。他们或遭惨杀，或被长期禁闭狱中，或被折磨致死。如日共中央委员岩田义道，1932 年 10 月被捕，11 月惨死；著名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1933 年 2 月 20 日中午，在东京赤坂福吉町被警察逮捕，立即被押送到筑地警察署。小林受到警视厅特高科警察中川、山口、须田等人先后长达三个多小时的极其野蛮的拷问后，于下午 7 点 40 分停止了呼吸。鲁迅先生在小林多喜二遇害后，发去唁电，号召中日两国人民，沿着小林多喜二的血路，并肩奋进！还有，日共中央领导人野吕荣太郎 1933 年 10 月被捕，于次年 2 月惨死狱中，等等，等等。

这里，不能不提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教条主义

倾向，也给日本革命带来严重后果，使日共在 1935 年前，没有把反法西斯斗争作为中心任务，积极团结一切反法西斯力量共同战斗。1935 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号召建立包括一切民主主义、和平主义者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

1935 年 2 月 10 日，日共代表野坂参三、山本悬藏在莫斯科联名发表《给日本共产主义者的信》，纠正了过去过低估计法西斯的危险及党的宗派主义等缺点。信中明确指出：当前，法西斯战争是日本的最大危险，法西斯军部是日本人民最主要的敌人。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组织和群众，投入反军部反法西斯战争的斗争。但这时，日本共产党在国内的组织和力量，已遭到极其严重的摧残，全国性的活动，已难以展开。分散各地的少数共产党组织和党员，虽坚持活动，号召建立人民阵线，但又很快遭到镇压。人民阵线尚未建成，全面侵华战争就已爆发。日本无产阶级革命力量没能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向法西斯势力进行强有力的斗争，这是日本现代史上一个以大量革命人民的鲜血换来的极其严重的教训。

第三章

在华日人的反战活动

在日共的领导和影响下，侵华日军士兵也进行了反战活动。1932年日军进攻上海时，1月29日，有200多名士兵拒绝执行进攻命令，被解除武装，押回日本。2月21日，约300名士兵，在中国上海虹口附近举行集会，有人在会上散发了署名“革命士兵委员会”的宣言，号召日本士兵反对侵略中国，不要与中国军队作战。

1932年，驻东北地区宁安的七、八名日军士兵，反对侵华战争，密议投奔东北抗日义勇军，以便反对共同敌人。他们逃到唐头沟一带迷了路，被迫返回驻地，遭到枪杀。驻牡丹江市以北某地的日军守备队十多名士兵，带着中国抗日军队散发的反战宣传品，逃进森林，寻找抗日队伍，在被日军守备队追捕时，他们不愿被日军捉回，先后上吊自杀，或挨饿冻死于森林中。

1933年，在东北地区还发生过日军士兵舍生向我抗日救国军运送大量子弹的事情。那是1933年3月下旬，日军龟冈村一旅团长率领部队，企图一举占领我国东北地区的汪清抗日根据地。根

据中共吉东局的决定，根据地军民在四周展开了政治攻势，在敌军必经的路口、山沟，在电线杆上、树干上，都张贴了红绿色的传单、或书写了大字标语，使不少日本士兵知道这块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由于我军在顽强抗击日军的同时，又对他们加强政治攻势，使龟冈村一旅团受到重大打击，被迫撤退。战斗结束后，这支抗日救国军的军长李延禄，去察看各个阵地，战士们正在掩埋牺牲的战友，李延禄站在烈士们的遗体前，默默辨认着，向他们作最后的告别。在辨认中，他突然一愣，发现烈士遗体中，竟有一具日本兵的尸体！

“为什么把他抬来？”李延禄不满地问别动队的同志。

“军长，他可能是我们的同志，这一车子弹，可能就是他送给我们的。”别动队队长说完，从口袋中掏出一张纸，递给李延禄。李延禄看着密密麻麻的日文字，更加迷惑起来。

队长接着说：“我带着别动队员在松林里发现一辆汽车，发动机被破坏了。当时，我也迷惑不解：敌人为什么不把它拉走，反而破坏了？当我们离开松林，再向南搜索时，便在嘎呀河边，发现了这具日本士兵的尸体。离这尸体十几步，有一块石头，压着一张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条。哦！就是这张纸条。”

李延禄立即找一位懂日文的同志来看，纸上写的是：

亲爱的中国游击队同志们：

我看到你们撒在山沟里的宣传品，知道你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你们是爱国主义者，也是国际主义者。我很想和你们会面，同去打倒共同的敌人。但我被法西斯野兽们包围着，走投无路，我决心自杀了。我把我运来的十万发子弹赠给贵军。它藏在北面松林里。请你们瞄准日

当时的中共吉东局书记董长荣，曾留学日本，很善于做对日军的宣传、瓦解工作。

本法西斯军射击。我虽身死，但革命精神长存。祝神圣的共产主义事业早日成功！

关东军间岛日本辎重队

共产党员 伊田助男

1933年3月30日

三天以后，抗日救国军和马家大屯的乡亲们，安葬了伊田助男，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还把马家大屯小学，改名为“伊田小学”，以永远纪念这位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反战英雄、日本共产党员。

在华的日本人士，如川合贞吉、尾崎秀实等等，也自觉地投入了反战斗争行列。川合贞吉，1901年8月18日出生在日本岐阜县。长大后在亲戚家开的金属机械厂当学徒，阅读了列宁在1916年发表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思想上受到很深的教育和影响，开始憎恨帝国主义和世界大战。1922年，他进入明治大学，参加学生社会科学研究会，结识了浅沼稻次郎等社会主义者，开始关心中国的情况。1928年，他来到北京。1930年8月，到《上海周报》社工作，参加社会主义研究会。11月与中国共产党的王学文取得联系，组织日中斗争同盟，开始进行反战活动。日中斗争同盟成员有：小松重雄（满洲铁道有限公司职员）、副岛龙、手岛博俊（无固定职业者）、西里龙夫（《上海日报》记者）、嘉久某、川合贞吉、王学文、杨某（台湾人，又称刘孙，原名侯朝宗）、姜某（又叫陈伍、杨柳青，原名蒋文来）等。

日中斗争同盟受中国外兵委员会和中国反帝同盟领导。杨某负责与中国外兵委员会联络，王学文为中国反帝同盟的联络员。这个同盟的活动，由其成员集体讨论决定。

该同盟成立后，就开展了反战活动。主要是搞宣传，以当时在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士兵和停泊在黄浦江上的驱逐舰水兵为对象。川合贞吉在《回忆录》里写道：“我们每天夜里，要躲过敌